

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

罗时进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图书、兴学、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显示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以及明清江南士人的精神趋尚、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江南之独特的文化地位也由这一文化型社会的形成而得到确立,成为我国地域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明清地域文化研究、家族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中,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形成都是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现象。

关键词: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9)05-0065-07

所谓“文化型社会”,是一种以“文化”为士人精神趋尚、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的社会文化环境。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为普遍表现、以图书为人文支点、以兴学为基础力量、以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是中国古代社会南方文明的极致形态,显示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在明清地域文化研究、家族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中,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形成都是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现象。本文从艺文、图书、兴学、隐读四个方面对其构成进行解析和阐释。

一、艺文: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普遍表现

江南中古以后在全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文的首善之区,既拜历史变动中士人汇聚之赐,同时也与其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关。膏腴调顺的自然地利能够保障物质生活的丰裕,而风物清嘉、钟灵毓秀的山水给与文人精神

的陶冶和灵感的启迪,正所谓江山之助,“山水之名腾布于词林艺苑中,是真湖山灵秀之气所发见者也。”^[1]穆彰阿为吴县潘世恩《潘氏科名草》所为序有言:“盖闻文章之事关乎其人之学之养,而其所由极盛而不已者,则非尽其人之学之养为之,而山川风气为之也。江南乃古名胜之区,其分野则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则旁接乎闽越,而又襟长江而带大河,挺奇峰而出秀巘,故其灵异之气往往钟于人而发于文章。前人对江南艺文的一切赞美哪怕带有某种鼓吹意味也毋庸异议,因为这确实是海内千百年从未产生,其他地域环境中也难以复现的人文胜景。

严格说来,江南艺文社会的真正形成是在明代,而重要的标志便是文豪硕儒辈出,艺苑巨匠腾跃。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嘉靖年间陆师道在《袁永之文集序》中开出的一份明代吴中文苑英才清单:

吴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镠东箭,地不绝产,家不乏珍,宗工巨

收稿日期:2009-06-10

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男,江苏东台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江南文化氏族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03BZW031)

人,盖更仆不能悉数也。至于我朝,受命郡重,扶冯王化所先,英奇瑰杰之才,应运而出,尤特盛于天下。洪武初,高、杨四隼,领袖艺苑。永宣间,王、陈诸公,矩矱词林。至于英孝之际,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当钧冶,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向风景服,靡然而从之。时则有李太仆贞伯、沈处士启南、祝通判希哲、杨仪制君谦、都少卿元敬、文待诏征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毅、蔡孔目九逵,先后继起,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来,诸公稍稍凋谢,而后来之秀,则有黄贡士勉之、王太学履吉、陆给事浚明、皇甫佥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颉颃其间。

这份名录才开到明嘉靖中期,后来英哲宗师,复有多少,而整个江南,岂能尽数!明中期松江名宦陆深于《俨山集》卷四十《送沈子龙别驾之任汝宁序》中论松江风俗曰:“衣食饶洽,人尚艺文,居民得以耕织自足。而僻处海隅,无通都奇丽之习,盖淳如也。近年文风尤盛,家诗书而户笔墨。”吴人陆燾在《陆子余集》卷一《仙华集后序》亦云:“吴自昔以文学擅天下,盖不独名卿才士大夫之述作,煊赫流荒,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之绝。……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正是江南地区人文蔚起,且前辈汲引后进,后辈景从先达,形成家家礼乐,人人诗书的局面,使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人物链从未断裂。儒林艺苑森茂,流风愈益光大,艺文社会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江南之为艺文社会,不仅是词林世界,还是一个涵容广阔的艺术天地。戏曲方面,吴江派与临川派旗鼓相当,而从顾阿瑛“玉山佳处”到魏良辅、梁辰鱼全面改革昆曲,使明代戏曲文学走向繁荣。明清之际,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崛起江南,于戏曲发展影响亦巨,太仓吴伟业以《秣陵春》等曲抒兴亡之感,亦无愧曲坛圣手。顺康朝,吴下“老名士”尤侗创作最为丰富,所作有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及传奇《钧天乐》,曾有作品传入禁

中,顺治帝誉为“真才子”。此际吴江派戏曲一脉未衰,沈璟侄沈自晋入清后隐居吴山,度曲不断,沈璟从侄沈永令在顺康间著有《桃花寨传奇》,另一从侄沈永乔著有《丽鸟媒》、《玉带城》二种,而沈自晋侄孙沈辛楙亦工词曲,著有《沈龙媒散曲》,今尚有作品存世,沈氏曲学流风不息可见。乾隆中吴县沈起凤所作戏曲不下三、四十种,风行大江南北,而在阳羨一地,万树所著杂剧与传奇就达二十余种,镇江近代丁传靖以传奇为世称重,今传其《七县果》、《霜天碧》、《沧桑艳》三种,其中《沧桑艳》为时代写沧桑变史,最为感人。他曾于1910年携此剧入都门,一时传诵,惊为绝作,为清代江南戏曲赢得了最后的辉煌。

书画之道,不能不论,它是江南最具代表性的艺术门类。常州有“一族而多画”的以恽南田为代表的恽氏画学,苏州有吴门画派、虞山画派,松江有董(其昌)、陈(继儒)书画并称,太仓有王时敏画族,此其画史卓荦者,在中国艺术史上影响至为深远。而清代江南书画艺术尚不止于此。观清嘉庆间的《梁溪书画征》,仅无锡一地,便收自汉高彪迄清,凡九十三人,尚未含流寓和方外者。镇江一地,有清一代画坛同样名家辈出。清初京江画坛开始活跃,山水画创作上,谈耕之写远山枯树尤佳,其蹊径在寻常画史之外;笪重光则对经典的“米氏云山”进行改造,以写意性笔法见胜。康熙年间“京口三大家”的蔡嘉、蒋璋、张淇名重一时,鲍皋、黄石、蒋宗海及周曾培、周序培兄弟亦活跃于京江绘林。乾隆朝王文治、潘恭寿独步京江。王氏得“浓墨状元,淡墨探花”之誉从京师退归故里后即为潘恭寿所作《山水卷》题诗,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潘画王题”的书画合作,留下作品达百幅之多。明代唐寅有“生涯画笔兼诗笔”之谓,王文治也曾提出“诗画同源”之说,江南士族诗、书、画兼修并工,素养和成就超群绝伦,极能显示江南地域文化的优势和特色,成为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普遍表现。

二、图书:江南文化型社会的人文支点

南朝至唐宋,江南无图书社会可言,北宋藏书

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时福建、浙江渐多,而江南并不集中,如吴县叶梦得、无锡尤袤、松江庄肃这样典籍极富的藏书家尚不多见。南宋以后,江南由于冠冕氏族云集,经济转趋繁荣,刊刻行业迅速发展,图书市场走向成熟,加之汉学复兴对原典研究的需要,使公私藏书渐成风尚,到明清时期,江南图书社会已经颇成气候了,江南各地的藏书之富相当可观,足领全国之冠。

江南图书社会的出现,首先得益于江南士人长期形成的崇文观念。汪琬《传是楼记》有一段记载后来常常为人们引用:

先生(按指昆山徐乾学)召诸子登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尝慨其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娱乐也。吾方鉴此,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曰‘传是’。”

无论徐乾学的为人有多少可议之处,就此段议论而言,确实洞达明理,更重要的是,它传达出明清时代江南人右文宝书的强烈意识。这里有两个可以佐证例子。明中期松江名宦陆深《京中家书》云:“家内藏书克晾晒收束……此传子孙至宝也。”明末清初吴江人吴扶九,是朱彝尊的姻亲(其子吴南龄系竹垞之婿)。扶九值明清易代,遂绝志仕进,杜门著述,笃嗜天官象纬之学。好藏书,所藏明人文集至三千七百家,手自纂辑,宝爱异常。《明代千遗民诗咏》有诗云:“扶九居吴江,复社赖主持。破产我不顾,灭门人或嗤。楹书付爱子,竹垞曾录之。”^[2]如果说陆深欲传书于子孙乃为江南传统文人情结的话,吴扶九于鼎革板荡之际,破产灭门都无所谓,唯欲将藏书传与爱子,足可解释江南藏书文化的“传是”观念是何等深入骨髓,坚定执著!

明清江南刻书业的发达,是这一地区藏书风气形成的极大的助推力量。明代常、锡、苏、松四地私人雕版刻印业非常兴盛,明中叶时刻工就有六百五十多人,著名刻书坊(斋、堂、阁)有一百多

家,加之一些活字刻印家,江南一带书坊真灿若星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其精,吴为最”。入清以后,江南私家刻书业更盛,专业梓人、坊贾、学者、诗家都加盟此业,一时盛况空前,苏州席鉴扫叶山房、昭文张海鹏借月山房、吴县黄丕烈士礼居、元和顾广圻思适斋、长洲顾嗣立秀野草堂、江阴缪荃孙艺风堂等,都是闻名遐迩的书坊(斋、堂、阁),他们和江南其他各地家刻者使大批宋元版本得以面世,孤稿秘籍赖以流布,所刻书籍往往不胫而半天下,其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功莫大焉。

明代私人藏书风气盛行,远非宋元两代可比。著名藏书家有四百二十七人,^[3]其中江南所占比例甚大。钱谦益曾述及明代中吴最富度藏的几位诗人云:“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俞贞木及其祖琰)、笠泽虞氏(虞堪)、庐山陈氏(陈继之伯汝秩及父汝言),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这里“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一语值得注意。有学者统计,仅苏州一地,明代藏书家即有一百八十五人之众,其中著名学者、文学家几近泰半,如此藏书家队伍,其博雅程度当远胜他处。

入清以后,江南藏书之风愈益为炽,藏书楼栉比鳞次。以常熟为例,清一代著名的藏书楼即有赵氏脉望馆(琦美)、钱氏(谦益)绛云楼、冯氏(班)空居阁、钱氏(曾)也是园、张氏(金吾)之爱日精庐、瞿氏(鏞)之铁琴铜剑楼、席氏(启寓)之琴川书屋、陈氏(揆)之稽瑞楼、顾氏(湘)之小石山房、翁氏(心存)之知止斋、孙氏(从添)之上善堂、赵氏(宗建)之旧山堂和丁氏(祖荫)之湘素楼,这些都在藏书史上留下过浓重笔墨。

当然,如果仅以藏书家和藏书楼的数量之多来证明江南图书社会的形成,是相当皮相的。藏书家和藏书楼的数量固然可以印证书籍资源丰富与否,度藏风气如何,却不能说明拥有这些资源、形成这种风气的动因和内质;倒是江南藏书家和藏书楼后面的事迹,更能揭示某种精神。试看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八:

(顾)开林于世事无所好,而性独好书,

闻人有善书,必多方购得之。……非力所能得,则手自抄录,穷日夜可尽百十纸。夜尝不寐,寐亦只尽数刻,张灯披衣,往往达旦。手不释卷,不停抄,自以为愉快极,虽老至,不自知也。

王芑孙《黄茺圃陶陶室记》:

今天下好宋板书,未有如茺圃者也。茺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板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敞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茺圃亦时自笑也。

这类事迹在江南文化家族的传记资料中随手可拣,从中可以窥见江南士族博雅好古的气质,以及对书籍文物的敬畏和抄藏图书的艰辛,亦可知江南地区不仅聚书繁富,且士族普遍具有好书之雅、敬书之诚、嗜书之笃、求书之切、鉴书之精的特点。明代常熟何大成曾有“抄书与游山,此乐可忘死”的诗句,而黄丕烈云“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这都表明江南士族已经将抄书、收藏、研究化成了日常生活的内容,成为生活的存在方式和审美方式,而这正是构筑江南图书社会最重要的人文支点。

三、兴学: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基础力量

江南社会的尚文与重学是相互联系的。如果说艺文和藏书是江南文化士族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读书则是江南文化士族的生命种性,而兴学便成为对这一生命种性的激发和育成。于家族而言,这既是基本责任,也是最高使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当为解读“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关键,否则将无法理解江南文化环境的形成发展、江南社会的知识密集、江南尚文传统的深涵茂育、江南士族的才俊辈出,也无法理解文化家族在江南世代光耀而蔚为大观的力量之源。

关于江南之所以具有天下人才的绝对优势,光绪朝江苏巡抚陈夔龙分析为两个原因:

南方火德,光耀奎壁,其间山水之钟毓,

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此一因也。冠盖京师,凡登揆席而跻九列者,半属江南人士。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半生温饱,尽是王曾;年少屐裙,转羞梁灏。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此又一因也。

此二点固为不刊之说,但江南文化家族重学、江南士人向学的精神气质却不可不加关注。十五世纪末年,途经江南的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间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这显然和家诗书而户礼乐的向学传统和价值观有关。要了解这一点,最直接的观察视角是家乘、宗谱的祖训,“读书起家,光显前人”、“丕振家声,首先读书”之类的箴言被极其慎重而不辞雷同地写进家乘、宗谱。值得注意的是,士族反复强调“书种不绝”、“不断书香”,在希望子孙绵延世泽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对“文化种子”绝嗣的家族性焦虑和忧患,因为这实在是关系到能否不坠家声、不辱门风,进而累世隆奕的命脉所在。正是出于这种慎终追远的焦虑和忧患,清代同光间无锡人荣汝楫在读到自己家族从明代传下来的家训时,发现因年代久远,居然有关教育的内容散逸了,大为惊异。为弥补这个重大缺失,他特地把康熙朝理学名臣陆陇其有关家庭教育的数则格言附在家训之后,要求“凡我族中贤者,幸展诵宣讲之,俾人人咸知此意,庶几荣氏之兴未有艾也”。^[4]

明清江南的兴学一般可分为社会性的和家族性的两类。社会性教育主要为府、州、县、社学以及书院之设立。在江南,范仲淹“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之说受到士族推崇,社会兴学重教传统深厚。据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二载,明末松江“除乡贤奉祠生及告老衣巾生而外,见列于岁科红案者,廪、增、附生,共约六百五十余名。以一府五学计之,大概三千有余,比昔三年两试,科入新生每县六十余名,岁入稍增至七十。其间稍有盈缩,学臣得便宜从事。是以少年子弟,援笔成文者,立登庠序。一时家絃户诵,

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极隆焉”。从松江学校的一方景观，整个江南学校盛况可以想见。

江南书院明清时代以无锡东林书院影响最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镇江府金坛县的志矩堂、常州府武进县的龙城书院（经正堂）、宜兴县的明道书院、苏州府常熟县的虞山书院、松江府的日新书院、嘉兴府的仁文书院等，曾形成了一个环太湖的书院网络。明中晚至清初，因士大夫借书院讲学抨击时政，一度遭毁。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定，对书院的政策也由抑制转为提倡，故江南书院迅速发展，不但虞山书院等恢复办学，一批新书院也得以建立。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汤斌在太仓创建安道书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张伯行在苏州创立紫阳书院，乾隆十三年（1748）翁藻、凌如焕等创立申江书院，皆有名当时。吴中七子赵文哲、黄文莲、曹仁虎、王昶等以及后来任《四库全书》总纂的陆锡熊皆曾入学申江（乾隆三十五年改名为敬业书院），一时人才济济，而娄东书院（太仓）、云间书院（松江）、紫阳书院（苏州）、正谊书院（苏州）、暨阳书院（江阴）及创建较迟的南菁书院（江阴）皆有名儒宿耆主持讲席。书院对江南人才育成厥功甚伟，且在文学之外，拓宽了理学教育途径。著名学者太仓人管志道曾说：“吾吴以文学名于世，而理学一窍独塞，今毗陵有数君子，彬彬向学，不谓众象之鸾凤不可也。”^[5]毗陵以及吴地在清代居然理学、经学大家接踵频出，与书院之间的脉络联系是不难寻绎的。

与学校、书院这类社会性兴教相比，族学的意义不可忽视，它对文化家族的形成并保持名阀传世，更具有基础性教育的意义。族学，或称“家塾”、“义塾”。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邑人最重读书，十室之聚，必有乡塾以教童蒙。自北宋“范氏义庄”始，江南就有了借族田之力开办族学的传统。雍正年间，候选员外常熟陶箬创立浔阳义庄，乾隆时《长洲县志》云：“陶箬复捐金千八百两，建屋三十二楹为义庄，贮经史诸书，许子姓之能读书者，取阅通经。道光十九年，苏州丁锦涛建丁氏义庄，其子士良、士涵、士溥、士济遵其父锦涛遗命，

在义庄旁舍建义塾屋十二楹，中有三贤祠，祀汉丁宽、唐丁公著、明丁元复，积书三万余卷。义庄又多设义学，教化本族子弟，其办学宗旨亦与官办学一样，苏州各大姓一般都有自家的义学，义学以义田为经济支撑。康熙、乾隆时期，苏州府长洲县的吴氏家族积累了大量田产，并置田 100 多顷，道光二十三年，又建立了义庄，“以贍宗族，设公产义塾以仁邻里之志”。^[6]长州陆氏义庄不算五百亩义庄田，仅祠堂、庄屋、义塾等费，就达二万金有余。这些义庄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规条，要求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在这方面长洲彭氏家族非常典型。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彭珑传》云：“彭氏在明时仕不过七品，自珑以后，一门鼎贵，为三吴望族。珑治家整肃，至今子弟恪守庭训，不逾规矩，有万石之遗风。江南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当以彭氏为矜式焉。而彭氏家族为了保证“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彭氏宗谱条例》），义庄助学支出竟高达族田租入总支出的 32%。^[7]

在江南不少家族为保证族学，还专设了学（书）田。如无锡杨氏义庄，在八十亩祭田外，另建塾田七十亩。常熟屈敏山捐膏火田六百亩为书田，以贍屈氏家族中能读书的子弟。苏州曹氏在一百亩祭田外，另设一百亩书田，九十亩义塾田。苏州吴氏宗族义庄共有义田六百亩，其中学田一百亩，专供宗族内设学之用，如学田收入不敷开支，再用其他义田的收入补助。光绪八年苏州《吴氏支谱》卷一二中收有《劝学田记》，对经费开支的具体项目和标准作了要求：“故必以百亩，不足则以别田余粟佐之。延举业师，贴米十二石；句读师，贴米十石；游庠，赏米三石；每年纸笔米二石；应乡试，米二石；中式，五石；会试三石，发甲十石；初学成文，每年纸笔米一石；院试一石，考遗才一石，放科一石。将江南世族这类帐簿排比出来，枯燥的数字中能显示出浓厚的人文意味，因为在强有力的族田保障的背后，不仅能见到基于江南富庶环境和世族经济基础的物质支撑能量，同时可见这些江南家族在将文化崇拜意识化为兴学行为时是如何的不遗余力！

四、隐读：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地域特色

“隐读”虽非江南所特有之现象，但对于江南士人而言，却有着与他处明显不同的实现方式与地域风貌，尤其在明清两代，它不但可以作为江南文化型社会的突出表征，而且显示出江南之为江南的某些特质和江南文人鲜明的文化个性，对于观察江南文学的美学品质及文人的性格结构形成，也是相当可靠和富有意蕴的视角。

“隐”原本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与“出”一样，是传统士人天然精神之另一面。其实“处”与“出”的可能性往往并存于相同的时空，趋处趋出，待激而择。“激”的指向，因不同的地域文化环境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苍莽朔塞之风土催扬激荡驰动、金戈铁马之思，暖风软水之风土润生安土重迁、斯守斯保之念；质厚刚毅之习俗孕育强梁取义之士，而冲融熙和之习俗多产文雅柔慧之族；政治化、伦理化的地域人文环境易激发外扬的性格，指向“出”的一途，生活化、审美化的地域人文环境则易孕育内敛的情感，指向“处”的一途。南北文化差异大体可以据此甄别，其间虽非泾渭之别——如清代常州地区就曾不断出现“慧士”，震动朝野——但论其大较，则无疑可作如是观。这也是江南隐逸现象相当普遍，隐读之士处处可见的主要原因。

当然，江南隐居之士，既有本土的，也有大量从北方南迁的，后者北枳而南橘，其间颇与政治力影响有关。永嘉南迁，六朝名士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启江南隐读风气之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人南来，隐读之风又一次煽扬。靖康之变后，大批缙绅冠冕扈跸南渡后，其中不少士人由仕而隐。其时，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无所不在。元末金瓯剧变，山河板荡，士族所选择的避隐之地，仍然是相对安宁的以吴地为中心的江南，这就形成了一批虽居市廛却如处岩壑的城市山人，造成了江南隐读阶层的聚型，也使得江南文化家族具有了某种新的存在方式。

明清鼎革之际这种转向山林的现象更在在可见。明末清初溧阳人芮长恤，初名城，与狄云鼎同

庚，为濂上十三子社成员。明亡后，弃诸生，更名长恤，隐山中耕读，杜门著述，不与权贵交往，足不入户四十年。徐懋勋，字剑公，号南州，松江诸生，著《耕余草》。清嘉山水提供了斯守斯保的绝胜天地，有着极大的诱惑，他们依才分与习性，或耕隐，或医隐，或佛隐，或圃隐，或画隐，而隐读则成为文人在江南乐土上的共同选择。虽然地点有所不同，形式亦各有异，但作为一种集文化性、知识性、娱乐性、休闲性、审美性于一体的清雅的文士生活，既有体面和尊严，又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成为普遍的趋归。

推究明清江南——尤其是吴中——隐读风气的形成，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也有地方先贤开创风气的影响。这里不能不注意两位人物，一是顾阿瑛，一是沈周。顾阿瑛的生存方式是大隐于市而偏得声色享乐，寄情于艺而显示风雅高洁。其给吴文苑留下的“风流儒雅”式的不拘礼教，放浪通脱的风调，从此绵延不绝；后来沈周的儒行雅迹、会友赋诗、隐于文物，从一定意义上说都不无阿瑛的影响。而沈周“有竹居”的“耕读”方式仍然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淡化了声色享乐的色彩，所谓“酒醉又移花下席，书多别起竹间楼”（《藏书诗》），同样是风流自放，但隐逸的生活中更多了些由读书而产生的文化气息。“吴中前辈，沿习元末国初风尚，枕籍诗书，以嗽名干谒为耻。”流风所及，明清吴中乃至江南士人，都以隐读自高。显然，吴中乃至江南的隐读有着一种特殊的高雅情致。时平之日，在江南这一方清山秀水中，本身享有富裕生活的名士们所谓的“隐读”——哪怕他们自名为“耕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得自由心性即乐天自适的需要，而乐天自适的最高境界是具有审美意义的处优养雅。这些名士即使走出江南，“隐读”作为一种生命的基因，仍将顽强地表现出来。王鏊《吴宽神道碑》有一段关于吴宽的记载云：“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热。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冶园亭，杂蒔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吴宽为逃避政治风险自我设计了一个精致养雅的京师

隐读环境,而这正是江南隐读社会的一个缩影。

总之,明清时代江南以艺文为普遍表现、以图书为人文支点、以兴学为基础力量、以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为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建立了一个相当广大的基地,江南之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积累至此时形成了最丰富而厚重的成果,江南之独特的文化地位也由这一文化型社会的形成而得到确立,成为我国地域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明清地缘文化研究、家族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中,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形成都是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现象,它不仅对明清两代之江南具有认识价值,对理解当代江南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 陆深《俨山集》卷九七《凉中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朱处士存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 2007年版。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

叶梦珠《闻世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

王鏊《震泽集》卷十三《吴宽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参考文献:

- [1]重修常昭合志:卷 32[M].光绪甲辰本.
- [2]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卷 8[M]//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284.
- [3]吴枫.中国古代文献学[M].济南:齐鲁书社,1982:210.
- [4]荣福龄.纂修无锡荣氏宗谱·家训:卷 22[M].民国 24年三乐堂本.
- [5]管志道.问辨牍·元集·答俞宪副定所丈书[M].明万历间刻本.
- [6]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78.
- [7]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4.

Structure of the Culture-oriented Society in Southeast Chin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UO Shi-j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A culture-oriented society came into being in Southeast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4th - early 20th century), characterized by advocacy of art, printing of books, running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reclusive learning. A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the geography, history and humanities of Southeast China, it revealed the particular individuality of the local culture there and then as well as the local scholars' moral and ethical orientations and their life style and content. The cultural status of Southeast China has also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shaping of this culture-oriented society, marking a milestone in China's regional-culture history. It is, therefore,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tudy of regional and familial cultures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times.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times; Southeast China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culture-oriented society

(责任编辑 吴波)